

绪 论

一、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定义

城市的历史可以远溯至上古时代。原始社会的夕阳余辉刚一消失，城市的晨曦便出现在地平线上。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的框限，城市的发展长期徘徊滞缓，步履蹒跚。只是到了近代，大机器工业的问世，才使城市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同中世纪西欧城市比之东方城市在规模上多有逊色一样，近代东方城市与西方相比，发展的道路充满坎坷和曲折，弥漫着病态色彩。大连、上海、广州、天津等便是近代中国城市的典型代表。

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①”显然，作为城市，必须具备人口的密集性、主要经济部门的非农业性及居民的非血统联系的社会性这三个基本条件。那么，作为中国近代城市，除了具有以上一般性的要素外，还具有哪些质的规定性呢？对此，还没有文著专门论及，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时间性。英国的坚船利炮叩开天朝的国门，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亘延 110 年之久。所谓中国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第 57 页，1960 年版。

代城市，必须是属于 1840 年到 1949 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城市。

第二，资本主义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虽然在偏远地区自然经济仍在顽强地抵御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但另一方面，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已为商品经济所取代。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追求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必然产生工业在区位上的聚集，引起人口的集中。这样，或者形成了新的城市，或者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与范围。我们判断城市的社会属性，当然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标准。近代中外工商业资本几乎都集中于城市尤其东南沿海城市，从而使城市具有了资本主义特征。工业中已使用机器进行生产，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广泛存在，获取剩余价值是生产的终极目的，价值规律制约着生产过程，商品供应市场并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外国在华商业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重要的一环，它倾销外国工业品、外国在华企业的产品，并掠夺中国农矿产品。中国的商业资本也一改单纯是小生产交换的媒介，在经售中外工业品及采办工业原料的过程中也扮演了较重要角色。中外商业资本都在参与瓜分产业工人与农业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显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着近代中国城市经济。

第三，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近代中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少数地区沦为殖民地），因而近代城市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性。从城市主权上看，多数城市在形式上中国还有主权，实际上要受制于外国，而完全殖民地化的城市中国更无丝毫主权可言；从城市所有制结构看，外国

资本占垄断地位，中国资本居从属地位，即便个别城市中国资本较多，但由于外国在华拥有巨大的资本优势及诸多特权，这些城市仍然不能摆脱外国资本的束缚与倾轧，无法改变在生产、流通等领域内的明显劣势；从产业结构上看，农业停滞徘徊，基础工业普遍落后，轻工业和商业畸型膨胀；从空间结构上看，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支配下，帝国主义对沿海城市的大力经营，造成沿海与内地城市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平衡，而在具体城市中，大都仅重视租界及外国人居住与活动区域的经营，造成局部有序整体无序，空间结构效益低下；从城乡关系上看，不等价交换大大加剧了城乡的对立与农民的赤贫化，城市的畸型繁荣完全建立在广大农村凋零破败的基础之上；从城市与外国的联系上看，它是中外经济文化和信息联系的结合部，是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同时又是列强对华侵略和掠夺的根据地和桥头堡。

第四，封建性。城市工商业资本家还相当普遍地在农村经营封建地租剥削。在许多城市中；管理完全是衙门式的：视工商业为利藪，苛捐杂税繁多，征敛摊派不绝；有关法律、法规和条令，远谈不上法治，而是集中体现了中外统治者的意志，是人治、治人；管理机构庞杂，层次繁多，人浮于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忽视城市发展规划的制订，即便制订，或朝令夕改，或束之高阁。

显然，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城市应体现上述之时间性、资本主义性、殖民地半殖民地性和封建性等规定性。当然，不同的城市，尤其殖民地城市和半殖民地城市，若进行对比，对这些规定性所体现的程度与形式是不同的，比如大连、香港等殖民地城市，资本主义性十分明显；内地的一些城市的封建性特征就往往很鲜明。当然，事物不是一成不变

的。即便对同一个城市来说，不同的发展时期，某些规定性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至此，我们不妨这样为中国近代城市下定义：所谓中国近代城市，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境内那些居民集中居住的地域，其中绝大多数居民主要从事非农业的经济活动，一般兼有资本主义性、殖民地半殖民地性和封建性的特征。

二、关于近代沿海城市的概念与性质

近代沿海城市的概念应从时间、空间和经济功能三个方面去界定。中国近代沿海城市是相对于内地和边境城市而言的（严格说来，边境城市也应划入内地城市之列），其内涵为 1840 年至 1949 年间，中国那些滨临海岸，并以海港为依托，具有直接进行进出口贸易功能的城市；其外延包括 1840 年之后开港的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天津、汕头、烟台、大连、青岛等等。有的文章以北京距海较近，抚顺、唐山、淄博等隶属沿海省份，便把它们看作是近代沿海城市，这是不妥当的。

近代沿海城市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似乎已成定论。其实，这种定性并没有反映出最本质的特征。城市的性质只能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即生产方式来决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世纪城市只能是封建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近代城市必须是资本主义城市。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并不反映一种生产方式，它仅说明外来资本对民族经济的压迫，这种民族经济既包括本国资本主义也包括非资本主义的城市个体工商业及农村小农经济。许多内地城市中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少，远算不上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但它们已卷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故我们称

它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近代沿海城市集中了中国境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绝大部分，城市经济的主体已非前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了。主要生产部门装备了机器进行生产，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劳资关系广泛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支配着生产过程。城市中的商业、金融等机构也参预着剩余价值的瓜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近代沿海城市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当然，近代沿海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绝大部分掌握在外国资产阶级手中，属于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是比较弱小的。正是基于沿海城市的经济命脉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我们说，近代沿海城市是具有鲜明殖民地特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

三、关于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在沿海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有的文章认为，沿海地区人口绝对数字和人口密度大于内地，因而自由劳动力资源更为充足，故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快于内地。这是对近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缺乏认识。

近代中国人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飘零海外，近百年间累计达二三千万人，而从 1843 年到 1949 年，中国城镇人口总数也不过由 2070 万人增至 4900 万人，增加数不及或多接近同期去海外谋生人数。况且，城镇人口的增加虽然包括农村失业人口的移入即机械增长，但相当一部分却属城市原有人口的自然增殖。怎么能说在东南沿海地区，一部分失业人口成为华侨，“大部分则涌向沿海城市”呢？近代全国各地都存在大量失业人口而无法被城市经济吸收的问题。1927 年，全国农村无地农民占 55%，少地农民占 25%。这些农民，啼饥号寒，实际已成为自由劳动力，只是无路可

走，不得已滞留农村，挣扎在死亡线上，其人数至少也有好几千万。这些失业、无业者当然包括大量内地人口。1933 年对四川十七个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雇农占农村人口 10.6%；湖南十二处调查结果 11%；陕西十四处调查为 19.75%；山西四十三处调查为 10.39^①。即使是新疆“农民因耕地不足”在 1929 年之前，“每年赴中亚细亚为雇农者，动以万计”。再者，旧中国政治腐败，战祸频仍，水利建设无人过问，已有设施年久失修，因而灾害频繁发生。这是旧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1928 年天灾遍及二十一省，灾民达 7000 万人；1933 年黄河决口五十四处，受灾人口 360 万。灾民走投无路，或逃亡他乡，或饿毙路野。可见，无论内地还是沿海地区，过剩劳动力都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在城市，不仅存在着产业的后备军，而且存在着常备的失业人口。大量适龄人口无业可就，暂时找到工作的也有随时被解雇的危险。抗战胜利时，十大城市有 47 万失业工人。1947 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工人就将近 200 万。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是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唯一原因。本来，按照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就是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及小生产者的破产与分化过程。小生产的破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资本、劳动力、商品市场等条件，即所谓一极积累贫困，另一极积累资本。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低于总资本的增长速度，从而形成过剩人口。但在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大规模瓦解，并不是由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致，而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因而，小生产者所创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 263 页，第 106 页。

造的剩余劳动，绝大部分落入外国资产阶级的囊中。夏东元先生指出：“这种情况，规定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破坏和小生产者破产，一极上积累贫困，另一极不能相应地积累资本。^①”外国资产阶级虽然也在中国投资建厂，但所用资本与其在华掠夺的财富相比是很少的。中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民间私人资本）先天不足，其力量远不能与外国在华资本相匹敌。这样一来，即使把中外资本加在一起，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来说也无异于杯水车薪。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造成的过剩人口。丧失了旧世界而未获得新世界，这是近代中国人民极度贫困和苦难深重的根本原因，也是大量失业人口无法被近代工业吸收的根本原因。

沿海地区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因而不应到这里来寻找沿海城市发展原因。首先应指出，不应把农产品划入自然资源。所谓自然资源是指以天然形式存在的资源，包括土地、气候、海洋、森林、草场、野生动物、矿藏及能源等。农产品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产物，是人类的劳动产品，根本不属自然资源的范畴。沿海地区农产品种类多、数量大，仅反映它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不说明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衡量某地自然资源丰富与否，至少应看两个标准，一是资源与土地面积之比，二是人口与资源之比。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于内地，如果资源与土地面积之比再小于内地，那么沿海资源丰富之说就不能成立了。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多，显然土地资源并不充裕；森林覆盖率和储量首推黑、吉二省，川、滇、藏也占有相当部分，而沿海的华北、华东地区却微

夏东元：《略论中国近代社会自然经济的破坏》，《历史教学》，1962.9。

乎其微；沿海固然有可观的盐资源，但盐源主要还是集中在青海、滇、川三省，尤以青海为最，况且盐业在城市经济中并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煤炭是近代工业的主要能源，位于沿海省份的唐山、抚顺等地煤产量委实很高，但山西 1942 年煤产量达到 620 万吨，大约为当年全国产量的 11%；1910 年全国有煤矿 43 处，属于沿海地区的也不过 20 处。广州在发展速度上之所以为后起的上海超过，并不在于上海附近煤炭资源丰富，而是因为广州距山西、河北、辽宁等全国重要煤炭产地较远，西部贵州虽然产煤，但无铁路相沟通，西江上游浅滩多，运输不便，因而影响了广州的发展速度。上海周围地区煤产也少，但水陆交通方便，与华北、东北各主要煤产区的联系远比广州快捷。天津发展速度快于早期开放的福州、厦门、宁波，与其地处煤炭产地的华北不无关系。可见，从总体来说，无论省区面积与资源量之比，还是省区人口数量与资源量之比，沿海地区都明显小于内地。

四、关于近代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因

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快于内地城市，其直接原因在于大量的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的投入。

城市经济学告诉我们，所谓城市化，就是国内人口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社会过程。只有城市工商业发展了，人口就业才有了保障，而工商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大量的投资。封建社会的瓦解若按一般规律，是由劳动力市场、货币财富及商品市场的同步发展造成的，三者缺一不可。可是在近代中国，却恰恰不是这样。外国资产阶级将中国小生产者创造的剩余劳动大部分攫为己有，因此，外国资本是否在中国投资，投资多少，投在什么地方，就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经

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近代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货币资本远比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更为重要。

1843 至 1849 年间，外国在华创办的工业企业至少有 103 家，大部分设在上海。1913 年、1920 年和 1936 年，外国在华资本分别占中国境内所有近代企业的 83%、71% 和 76%。这些外国资本绝大多数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地。1897 年至 1936 年，中国全部航运业中的外国份额一直在 76—84% 之间。近代铁路基本集中在沿海省份并为沿海城市经济服务，大体上不是为外国人所有就是借外债修筑从而受其控制的。1894、1911 和 1927 年三年，外人所有或控制的铁路分别占全国铁路的 78%、93% 和 98%。也就是说，沿海城市经济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是由于外资的投入。

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中国资本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中。1933 年，属于中国的近代企业全国共 9679 家，上海占 35%，天津占 13%，而当年两市生产净值占全国的 73%。当年上海一地企业资本额占全国的 60%。1947 年全国企业有 12899 家，上海、天津共占 69%。中国资本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与优越的地理位置分不开。

这里发展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城市化的基础是农业。农业直接制约着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决定着城市吸收就业人员的数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可为城市工业品开辟市场，又可提供城市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料。近代农业整体来说是凋蔽的，但沿海城市所在地区发展农业条件较好。这里地势低缓，土壤肥沃，气候湿润，农作物生长期长，土地利用率高，农业人口多，加上自然条件优

越，产粮自然更多，从而就近向沿海城市多提供一些商品粮。1920至1923年间，上海、福州、广州和天津的粳米和小麦价格，都明显低于重庆、沈阳和北京^①。当然，这种价格与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也是有关联的。

沿海地区其他经济作物不仅品种多，而且产量也大。花生主要产于山东省；大豆主要产于辽宁及黑、吉两省；茶与蚕桑产于包括东南沿海在内的南方省份；棉花“最著者如江、浙、闽、广等省”。沿海省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加上特有的渔业生产，为沿海城市加工工业提供了较多的原料。

沿海城市所在地区人口稠密，为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商品市场。尽管近代农村普遍购买力很低，但人口密度大，毕竟为扩大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中外资本大量集中于沿海城市，与近代中外经济形势是相关的。外国资本敲开了中国的门户，它的根本目的是最终占有整个中国，而达到这个目标，却须由外而内，逐步深入，因而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头面前，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暴露于外的沿海城市。外国资本要想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不首先经营好沿海城市这个滩头阵地是不行的。只有沿海城市这个新的“中心”建立起来，帝国主义才能利用它向中国内地进行扩张。无论从供给者的需求圈（人口密度和家庭对市场依赖的程度）和商品的销售域（最佳运输成本和地理距离）来衡量，沿海城市都具备较好的发展前景。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在华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一定要在中国沿海发展航运业，故在沿海城市建立船舶修造和公用事业；外商利

^①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41页，第91页。

用中国本地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开设工厂，其产品运往国外，厂址选在沿海城市也最为合适；外商若将产品销往中国国内，企业可设在中国内地，但毕竟开放商埠有限，加之生产过程要用外来原料、燃料，故设在沿海城市也甚适宜。中国人要学习西方，赶超西方，把资本集中于沿海城市也最为理想。只有把这里变为中国先进的中心，才能推动内地“外围”的发展。

经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交通条件，而沿海城市交通易达性甚为理想。我国境内主要山脉除横断山脉系南北走向外，其余均为东西走向，因此发展东西交通具备有利条件。内地与沿海城市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要明显多于内地南北之间。另外，沿海城市从大连到广州，所在地区几乎完全是平原和低平丘陵地带，发展陆路交通极为有利。从 1881 年到 1949 年，中国境内建铁路 31990 公里，整个线路偏于东北和沿海地区。火车载运量大，行驶速度快，运行不受气候条件限制，因而适合于大宗货物长途运输和旅客运送。我国主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最终入海，而沿海城市大都兼有沿江（河）沿海两大优势。利用天然水道的水上运输，吨位不受限制，投资少，运量大，成本低。上海之所以发展甚快，与它位居江海之间有极大关系。广州正因为扼三江入海总口，才成为我国南大门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由于交通方便，空间缩短，中国东西、南北之间的交流更为活跃，中外联系也较便利，原料、燃料及粮食等物资保障较大，运费较低，增强了商品竞争力。上海附近不产小麦，市民也不以面食为主，上海却成为全国面粉中心，显然取利于交通之便。沙市棉花运入上海，每担运费 1.2 元，而印度棉花到沪仅 1 元。中国近代从 1867 年到 1947 年，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国家，

1932 年高达 7849 万担。其中稻米主要来自越南、泰国、缅甸、香港及印度，经海路运抵中国，沿海城市自然粮价要低一些。内地交通不畅，车马劳顿，导致价格上升，影响消费。

沿海城市之所以发展较快，与那里的聚集经济和相对比较合理的供给指向型经济是分不开的。沿海城市因吸引较多资本而成为较大城市，因而具备了聚集经济的效益，以优于小城市的速度发展着。它有利于地区内的专业化与协作生产，从而降低生产费用。它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因而有利于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这里信息比中、小城市灵通，有利于生产和市场的安排。这里竞争激烈，优胜劣汰，企业经营者素质更高。虽然城市是外向型经济，其产品销售或输出到外地是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若仅重视输出型企业，而忽视供应本市需求的基础部门的建设，那城市的发展就失去有力的保证。尽管外地需求刺激城市经济的增长，但该城市进一步增长就取决于其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即是否具有吸引额外生产要素的能力。事实上，沿海城市消费工业、市政建设管理、文化、教育及服务系统等都明显地优于内地，从而有力地吸引着外来资本的持续投入。

政治因素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近代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外敌入侵频仍，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工商业尤其内地工商业的发展备受阻碍。而沿海城市大多有外国租界，又远离半封建的政治中心，受到的骚扰，相对要少些，因而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近代中国政府对工商业者恣意勒索摊派，使得工商业者与外商建立联系，寻求庇护，因而中国人的资本有相当数量流入沿海城市。近代中国人投资工商业，除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驱使外，还

与抵御外敌侵略瓜分，富国强兵，昌盛国运相联系。应该说，郑观应痛撰《盛世危言》，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康有为呼号变法，拯救民族危亡，都对中国人投资建厂起到了促进作用。

沿海城市开风气之先，人们观念比较开放，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中国是半内陆、半海洋国家，内陆一侧与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接壤，海洋一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望。中国被迫开放后，沿海地区的人们相对于内地来说，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接触西方世界的机会。他们思想开化，对先进的东西更为敏感，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更强，不断挣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与之比较，内地的人们很少有机会获取工商致富的知识，也较难看到有关的感性实例。故不少人还因袭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旧观念。沿海地区不少饶有家资的人对投资新式企业，榨取剩余价值兴趣浓厚，而内地的富豪却更热衷于放高利贷致富和收地租发财。这种内地与沿海在观念和眼界方面的差异，不能不对资金的去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近代出国潮兴起于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以致于那里成了著名的侨乡。海外生活的经历是辛酸的，同时也开阔了华侨的眼界，练就了他们发愤图强的意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海外经营有术，积攒了较雄厚的财力。华侨有着光荣的爱国爱乡的传统，他们希望祖国变落后为先进，变贫弱为富强，所以踊跃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他们对乡梓的眷恋之情，驱使他们把资金重点投入广东、福建等侨乡；他们所具有的企业家的战略眼光，也推动着他们重视对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投资；他们还热情捐资在家乡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这些因素，必然促使沿海城市经济较快发展。

第一章 近代大连城市的兴起

第一节大连城市的形成

汉代初年，大连不过是沿海一个蕞尔渔村，当时叫三山浦。唐代改称青泥浦，明代称之为青泥洼，清代又有东、西青泥洼之分。历时两千余年，直到 19 世纪末期，这里仍然是渔帆点点，炊烟袅袅，完全没有城市的喧嚣。

1898 年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随即全力进行大连城市的建设。1902 年，昔日的渔村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初具规模的、崭新的近代城市，沙俄命名为“达里尼（俄文意为“遥远的”）。1905 年，日本以城市滨临大连湾，名之为大连。

为什么说 1902 年出现了大连城市呢？

沙俄经营大连从一开始就是要把它建成一座港口城市，我们判断大连城市是否出现，必须首先衡量大连港口出现与否。正是在 1902 年，大连港第一期建筑工程基本完成，商港初具规模并正式开放使用，约有 700 余艘次各国船只进出港口。大连这个港口城市的基本功能特征已经具备。

筑港的同时，大连市的市政建设与工商业也发展较快，从而带来了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1903 年 1 月 1 日，大连户籍人口已达 41260 人，其中市内人口为 3 万人。人口规模达到什么标准谓之城市，向无固定标准，人口密度较高与较

低的国家，标准就有很大的出入。但为了增加可比性，不少人认为以不低于 2 万人作为划市的标准比较合适（1900 年全世界 2 万人以上的城市其总人口为 1.51 亿）。显然，大连已达到了人口密集性的要求。

大连经济活动的主体体现了非农业性。整个大连人口的四分之三从事非农业。1902 年已初步形成了大连工商业社会。1903 年 1 月 1 日，大连有各类工商业 574 处。较重要的机械工厂有：大连机关车制造所，职工多达 700 人的大连最大的铁工厂——铸铁厂，由船渠、发电所和若干车间组成的利斯造船厂。属于建材工业的有石灰厂、木工场、炼瓦厂等。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则有自来水厂、旅馆、饭店等^①。大连中国人最早的商会——大连公议会在 1901 年 10 月就建立起来^②。

以中国近代城市所应具备的时间性、资本主义性、殖民地半殖民地性及封建性等几个规定性来衡量，大连城市自形成之日起，就是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

大连城市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大机器工业已经建立。上述之 574 家工商业中有 50 余家工业企业，基本上都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其中铸铁厂年产量可达 3000 吨，这些企业以榨取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目的，产品面向市场，因而它受到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在沙俄所属工厂中，工厂主不仅普遍压低工人工资，对中国工人尤

筱崎嘉郎：《大连》（日文版）第 11 页，大连市役所，1921 年。

② 傅疆：（美洲农务调查录·树林杂记·旅大商务录）第 11 页，明治阁，1906 年。

甚。中国工人的工资一般只相当于俄国同行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①。其次，沙俄通过大连港口贸易向中国东北倾销商品，向沙俄远东地区输出中国农副产品，反映了商业资本在参与对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以及对农业小生产者剩余劳动的攫取。此外，大连城市还具有资本主义城市的开放性，以及前资本主义城市无法比拟的较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东清铁路的建成，海外航路的增辟，扩大了大连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大连发电厂、瓦斯站与自来水厂的建设，沥青马路的铺设等，既体现了资本主义城市生产力水平，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前资本主义城市，手工业生产的分散性、狭小性等特点，使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改善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

大连是典型的殖民地城市。从市街布局看，全市分中国区、欧洲区和行政区三部分。欧洲区环境优雅，风光秀丽，可观望海上日出。从行政隶属关系上看，中国政府根本无权过问，大连归属沙俄远东大都督府管辖。城市经济所有制关系也能说明殖民地性质。凡属重要些的经济部门，都由沙俄垄断或参与。大连商港与大连铁路运输操纵在沙俄手中自不待言，当时规模稍大的铸铁厂、船厂、机关车制造所也为沙俄资本所独有。在其他行业中沙俄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②。中俄工人从事同种工作，中国工人却得到较低工资，同样说明殖民地性。

大连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性。沙俄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起步入帝国主义阶段，但

《沙俄侵占旅大的七年》第 28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 年。

② 《俄治时代的大连市》（日文版）第 34—37 页，关东厅，1931 年。

国内封建农奴制残余还大量存在，上层建筑依旧为专制政体，体现着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必然要反映到大连城市中来。大连郊区与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沙俄利用乡下的封建势力与地痞、流氓等人，把持郊区与农村的基层政治权力。大连市政官员的产生也不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由沙俄财政大臣推荐，以沙俄政府勒令的形式任命，并要直接受命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沙俄远东大总督^①。

综上所述，大连自 1902 年起，就是一座带有资本主义性、殖民地性及封建性的中国近代城市。与大多数中国近代城市相比，大连是完全的殖民地，资本主义性较为突出，封建性相对弱些。可以说，大连基本上是属于殖民地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

第二节 大连城市产生的背景与条件

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扩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提高，促进社会分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带来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功能、性质和社会属性的变化与演进。

蒸汽机在英国的一声长啸，唤来了工业革命的黎明。从此，大机器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便跃出国界樊篱而走向整个世界，创造了以往数千年人类文明史根本无法企及的巨大物

^① 《沙俄与旅大租借地》第 28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 年。